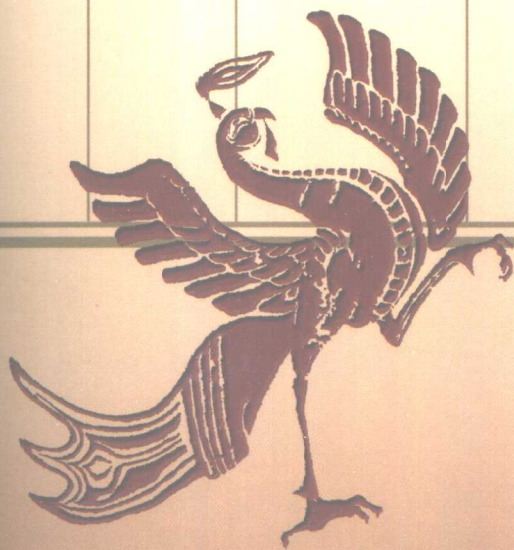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韬·三略译注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唐书文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韬·三略译注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唐书文 撰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六韬·三略译注

唐书文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131,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25-2649-6

B·305 定价:11.80元

总 目 录

六韬译注	1
前言	3
目录	8
卷一 文韬	11
卷二 武韬	40
卷三 龙韬	52
卷四 虎韬	82
卷五 豹韬	107
卷六 犬韬	121
 三略译注	139
前言	141
目录	145
上略	146
中略	164
下略	171

六 韜 译 注

前 言

唐初,《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有注云:“周文王师姜(吕)望撰。”元至正年间,《宋史·艺文志》著录《六韬》,注:“不知作者。”时代前进了七百来年,从注明作者到注明不知作者,是一个进步。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辞。但究其内容,所涉方方面面,却多七八百年以后才出现的事物。它为后人依托之作,十分明显。

《六韬》屡次提到骑兵,《龙韬》以后,凡谈到具体军事部署,都车骑并称。而骑兵,是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有人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中原各国才有骑兵。实际情况可能稍有出入。《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赵肃侯,说赵国“车千乘,骑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之父,可见早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已有骑兵。苏秦在游说其他国家时,还说魏襄王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楚威王有“车千乘,骑万匹”;说齐宣王有“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都车、骑并提。可见当时不止赵国,各国都已把骑兵的建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服骑射”不是骑兵出现之源,而是适应骑兵发展的一个改革措施。但骑兵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左传》描写了晋楚、晋齐之间的多次大的战役,都是车战、步战,没有骑战。《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年及

其以前的作战经验,也没有一字提到骑兵。而晚于孙武一百五六十年代的孙臧,却纵论用骑兵有“十利”,并指出“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臧被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任为军师,他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骑兵作了精辟的论述,足见骑兵大约就是在这稍前登上了中原各国的历史舞台的。《犬韬·均兵》一篇对骑兵的战斗编组,在平坦地形与险阻地形作战时的阵法,都有详细的记述;《武骑士》一篇对选拔武骑士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战骑》一篇对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作了精当的总结:认为都是骑兵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来判断,《六韬》的成书不能早于战国中期。

《虎韬·军用》一篇提到的兵器装备,也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篇中列举的几种大型战车,都是春秋时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叫做“武翼大橦矛戟扶胥”的战车和一种叫做“提翼小橦扶胥”的战车,都“绞车连弩自副”。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这从《孙子兵法·兵势》中用了“势如彀弩,节如发机”之喻可以得到证明。但弩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则是战国时的事。苏秦游说韩宣惠王时,曾夸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举了几种弩名,并说“韩卒超足而射”,即用脚踏之力射弩,却没有提到绞车连弩。可见绞车连弩是后起的兵器。绞车是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牵引机械,用来张弩,自然比臂拉或足踏有力得多。直至唐代,绞车弩仍是弩中射程最远(七百步)、威力最大的一种,较之“中三百步”的擘张弩、“中二百步”的马弩,遥遥领先。(见《通典》卷一四九)李靖《卫公兵法》所谓“木弩……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盛赞其杀伤力强。这种武器不到战国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又如篇中列举的铁制兵器或器械有十一种之多,不标明铁制而实为铁制的想必还有,这也是战

国中后期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斲,试诸壤土。”《管子·小匡》也记了这段话,作“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橛”。美金指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时期兵器多用铜制,铁则用以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这种格局,到战国时仍未大变,解放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以农具、手工业工具数量为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可以为证。铁器逐渐进入兵器领域,是战国中晚期的事。《虎韬·军用》篇提到十一种铁制兵器或军用器械,很能为《六韬》的成书年代提供论据。

前人也有认为《六韬》是汉代人采掇旧说撰写成书的。此说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不攻自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上,发掘出两座西汉前期墓葬,一号墓出土的4942枚竹简中,就有包括《六韬》在内的多种先秦兵书和其他著作(《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繚子》、《六韬》以及《晏子春秋》、《墨子》等)。根据墓葬年代和同时出土的书籍可以基本断定《六韬》是先秦古籍。另《庄子·徐无鬼》篇提到“《金板》、《六弢》”,司马彪、崔譔云:“皆《周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史·六弢》六篇”相合。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说:“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颜师古注《汉书》,也以《六弢》“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如果《六弢》确实就是《六韬》,那么《六韬》的成书,必须在《庄子·徐无鬼》撰成以前。《徐无鬼》是《庄子》杂篇,不是庄周亲撰,其后学撰成于《六韬》成书以后,也是可能的。这是《六韬》不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后的又一个证据。

这样,《六韬》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断为战国中(晚)期,《汉书·艺文志》注所列举的三种说法“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一、三两种都失之偏早,与内容不合。周显王时(前

368—前 321 年)有点接近,也略嫌稍前,应更在其后。

《六韬》的成书地域为太公故里齐地当是没有疑问的。《文韬·六守》提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的说法,认为:“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这正是齐国特有的地方组织形式。《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管子·小匡》也说:“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硕)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干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士、农、工、商,都要使他们“群萃而州(畴)处”。这就是“大农、大工、大商”的由来。《文韬·大礼》记文王问“主位”、“主听”、“主明”,太公答语与《管子·九守》文字整段相同。现已不可知是《六韬》袭用了《管子》,还是《管子》袭用了《六韬》,但二书都是齐文化的产物,在成书过程中互有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从成书年代和成书地域来看,《六韬》应是稷下学士可能是姜姓后人之作。

《六韬》不但是实战经验的总结,对前代兵书也有所借鉴,有所融汇。例如,《龙韬·论将》“将者,国之辅”的提法来源于《孙子兵法·谋攻》;《龙韬·立将》“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一段采自《尉缭子·武议》;《龙韬·将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至“是将威之所行也”一段,从内容到文字都与《尉缭子·武议》大致相同;《犬韬·教战》“使一人教战,教成,合之十人”至“合之三军之众”一段,与《吴子·治兵》、《尉缭子·勒卒令》都大致相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说明了《六韬》的作者对前代兵书有意识地参考借鉴,下了一番综合融汇的功夫。

《六韬》的政治思想,对前代的儒、道、法各家也兼收并蓄。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信罚必,《六韬》都加以

吸收包容。它开宗明义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而且再三重复这个论点（《武韬·发启》，又《顺启》）；认为“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文韬·国务》），又指出仁义道德之所在，“天下归之”（《文师》）；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它又认为，“天下之人如流水”，“静之则清”，“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武韬·文启》）；这些是道家的思想。它还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文韬·赏罚》）；“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龙韬·将威》）；这些是法家的思想。《六韬》兼容性的特点，与战国中期以后齐国稷下学术繁荣，较早地进入诸子学说逐渐合流的趋势有关。

《六韬》自西汉前期即为人所重，东汉以后，颇为盛行。为人所乐道的如刘备临终遗诏，要刘禅所读书中即有《六韬》，称赞它“益人意智”；诸葛亮也曾将《六韬》与《申》、《韩》、《管子》等书手抄一遍。（均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可见它对想要“取天下”的人是很有用的。它与《三略》并称，以至于在汉语词汇中形成了“韬略”这个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六韬》：“兵家权谋之书也。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号曰《七书》。”从宋神宗元丰年间始，《武经七书》成为武试的必读书。

本书用四库全书作为底本，校之以金人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朝朱镛《武经七书汇解》。凡底本义有所舛错，字有所厘正，皆出校语以明之。

作者

目 录

卷一 文韬	11
文师	11
盈虚	17
国务	20
大礼	21
明传	24
六守	25
守土	27
守国	29
上贤	31
举贤	34
赏罚	36
兵道	37
卷二 武韬	40
发启	40
文启	43
文伐	46
顺启	49
三疑	50

卷三 龙韬	52
王翼	52
论将	56
选将	58
立将	60
将威	63
励军	64
阴符	65
阴书	67
军势	68
奇兵	70
五音	73
兵征	76
农器	79
卷四 虎韬	82
军用	82
三陈	88
疾战	88
必出	90
军略	92
临境	94
动静	96
金鼓	98
绝道	100
略地	101
火战	103
垒虚	105

卷五 豹韬	107
林战	107
突战	108
敌强	110
敌武	112
乌云山兵	114
乌云泽兵	115
少众	117
分险	119
卷六 犬韬	121
分合	121
武锋	122
练士	123
教战	125
均兵	126
武车士	129
武骑士	130
战车	131
战骑	133
战步	136

卷 一 文 韜

文 师

1.1.1 文王将田^①，史编布卜曰^②：“田于渭阳^③，将大得焉。非龙非鬲，非虎非罴^④；兆得公侯^⑤，天遗汝师^⑥；以之佐昌^⑦，施及三王^⑧。”

文王曰：“兆致是乎？”

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⑨，得皋陶^⑩，兆比于此。”

【注释】①文王：周文王，姬姓，名昌，殷末为西伯，称西伯昌。《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齐太公世家》又说：“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太公之谋计居多。”可见西伯访吕尚时尚未称王，且文王为死后谥号，非生前所称，足证这是后人追述之作。 田：通畋，打猎。 ②史编：史，官职；编，其名。古代史官大多世袭，所以下文史编说他的太祖史畴也是史官。《周礼·春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而大史“大祭祀，与执事卜日”，可见史官也参与占卜的事。 布：陈列。布卜，指排列蓍草以进行占卜。《汉书·东方朔传》：“别蓍布卦。”陆游《晚晴出行近村闲咏景物》诗：“筮叟晨占手布蓍。” ③渭阳：渭水的北岸。但《吕氏春秋·谨听》说：“太公钓于滋泉，……文王得之而王。”滋泉又作兹泉，据《水经注·渭水上》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溪中有

泉，谓之兹泉……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渭水之右，即渭水之南，与渭阳之说不同。《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西伯“遇太公于渭之阳”，盖传闻之异。

④非龙非虬，非虎非熊；虬，音义同螭，古代传说中无角的龙。《史记·齐太公世家》：“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虬’（《索隐》曰：‘本亦作螭字。’），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

⑤公侯：《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据《书·周官》说，是太师、太傅、太保。王者之后，如宋国为商之后，其国君亦称为公。吕尚曾任文王、武王之太师，后又封齐为诸侯。《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成王时，“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因此吕尚既曾为公，又曾为侯。此处公侯即隐指吕尚。

⑥遗：送。⑦昌：指西伯昌。⑧施：延续。三王：指周文王、武王、成王。⑨太祖：指史编前代最早担任史官职务的祖先。

禹：传说中的古代部落联盟首领，姒姓，又称大禹、夏禹，一名文命。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后皋陶早死。

⑩皋陶(yáo 姚)：传说中古代东夷族的首领，偃姓。曾任帝舜掌管刑法的官，被舜誉为股肱之臣。

【译文】文王将要打猎，史编宣布占卜的结果说：“在渭水北岸打猎，将在那儿大有收获。不是龙也不是虬，不是虎也不是黑；卜兆显示将得到一位公侯，上天送来你的老师；用他来辅佐西伯昌，可以延续到三个王。”

文王说：“卜兆至于这样吗？”

史编说：“我的始祖史畴为禹占卜，得到皋陶，卜兆可以与此相比。”

1.1.2 文王乃斋三日^①，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②。

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耶？”

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之也。”

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

太公曰：“钓有三权^③：禄等以权，死等以权^④，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注释】①斋：古人在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前清心洁身（如不饮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沐浴更衣等），以示庄敬虔诚，称为斋。②太公：即吕尚，姜姓，字牙，其祖先封于吕，因以吕为氏。周代男子称名用氏不用姓，故名吕尚。“姜子牙”、“姜太公”是后代人不明当时习惯的俗称。据说周文王见到他后大为高兴，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又号“太公望”，因而也有人叫他吕望的。文王立他为太师后，又尊称他为“师尚父”。吕尚是伐纣的最大功臣，周代的开国元勋，齐国的始祖，所以被称为齐太公。司马迁说他“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③权：计谋，权术。《淮南子·主术训》：“任轻者易权。”高诱注：“权。谋也。”④死等以权：《孙子兵法·计》：“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孟氏（失其名，南朝梁以前人）注：“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

【译文】文王于是清心洁身斋戒三天，乘上打猎的车，驾着打猎的马，在渭水北岸打猎，终于看见太公坐在茅草上钓鱼。

文王慰问他并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太公说：“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他的志向，小人乐于做好他的事。如今我钓鱼与这很有些相似，恐怕不是喜欢钓鱼。”

文王说：“为什么说它有些相似呢？”

太公说：“钓鱼有三种权术：给人以利禄相当于钓鱼的权术，使人效死相当于钓鱼的权术，赐人官爵相当于钓鱼的权术。钓鱼是要得到收获，它和情理相当深奥，可以看到大的方面。”